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编者按:现在有一本很火的书叫《大数据时代》。在信息社会,数据将成为核心资源,就像农业时代的土地、工业时代的能源。中国正在朝着那个时代奔跑,但还有些距离。

真正把大数据推向公众视野的是一个叫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的人,他潜心研究大数据达10年之久,成为最早洞见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的数据科学家之一。《科学》杂志说,若要发起一场关于大数据的深入讨论,没有比他更好的发起者了。

究竟谁在引爆大数据?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来到《对话》,他能否告诉我们这些大数据中所蕴藏着的惊天秘密?拒绝大数据时代真的会失去生命吗?大数据时代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机会?LSI的未来比英特尔的要好吗?为什么GOOGLE会成为大数据时代的最大赢家?阿里巴巴是怎么“玩”大数据的?本期特此推出“大数据时代”专题,一解其惑。其他栏目的文章祈盼得到您的关注。

本期专题·大数据时代

- 02 央视《对话》:谁在引爆大数据
- 05 大数据时代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机会
- 06 LSI的未来比英特尔的要好吗
- 07 阿里怎么“玩”大数据

国是论衡

- 12 郑永年:改革,能否跟上社会变化的速度

政坛经纬

- 15 我接受了廉政公署的约谈

八面来风

- 16 外国共产党人怎么看中国
- 19 书的危机

悦读时光

- 封三 《蒋介石的阅读史》(三)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央视《对话》：谁在引爆大数据

你的一个习惯动作；你的一次消费行为；你的一份就诊记录；都正在被巨大的数字网络串联起来。移动互联网风潮汹涌。大数据正悄悄包围着我们。甚至连世界经济格局也在酝酿着巨大变革。

进入2013年，大数据被越来越多地提及，它已经上过《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的专栏封面，进入美国白宫官网的新闻，并频繁出现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电商、电信、金融等领域的大佬们的话语中。

不管是阿里巴巴的董事长马云，还是腾讯的董事长马化腾，还是招行的董事长马蔚华，都在谈论着大数据。亚马逊，沃尔玛，雅虎，IBM，苹果，Google 这些国际巨头，更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在大数据方面进行研究和布局。

然而真正把大数据推向公众视野的是一个叫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的人，他潜心研究大数据达10年之久，成为最早洞见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的数据科学家之一。《科学》杂志说，若要发起一场关乎大数据的深入讨论，没有比他更好的发起者了。2013年4月14日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来到《对话》，利用宝利通远程云视频技术与远在外地的各位嘉宾连线。他能否告诉我们这些大数据中所蕴藏着的惊天秘密？谁在引爆大数据？

GOOGLE 为什么会成为大数据时代的最大赢家



作为大数据时代来临最早的倡导者，《大数据》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先生在做客《对话》时，受到了很多大数据迷的追捧。而当他被问及：放眼全球所有公司，他最欣赏哪家公司在大数据时代的态度、作为，以及现在所挖到的最大的宝藏时，维克托推荐了一家公司。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我只能选一个吗？我觉得最好就是谷歌，很清楚。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大数据公司，因为他们理解大数据，他们理解大数据的核心所在，而且如果他没有看到这些数据可以进行多次的重新使用之前，他们不会进入这个市

场。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听到过谷歌眼镜，谷歌眼镜可以给你提供很多的信息，可以看到很多信息，可以问自己，为什么谷歌会对这些眼镜感兴趣呢，看起来很美，而且戴上也不清楚。但是大家思考一下，给你提供的是数据，现在我们可以确定一个人的位置，因为你带着智能手机，但是并不知道这个人走到哪里去，但是谷歌的眼镜需要知道你到底在看什么样的方向，谷歌通过这个眼镜知道你在看哪个广告，看了多长时间，是不是在看一个美丽的女士，看她的腿，还是看身体其它部分，谷歌眼镜都知道，谷歌甚至比你知道的还要多，谷歌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他们可以找到每个人行为准则，谷歌眼镜认为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值很多钱，值得他们投资，所以谷歌提供一个新的服务模式后。就要问自己，为什么谷歌提供这个服务呢，我相信因为他们会获得数据流。”

主持人陈伟鸿：“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人们都说一颗苹果掉了在牛顿头上，所以他发现了万有引力，我想知道一下，究竟是什么，让您发现了大数据这个宏伟的时代？”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过去是软件方面的工程师，而且我对经济学有一定的了解，最重要的是我经常去参加会议，举行三天会议，讨论因特网相关事情。我们看到世界上确实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人们希望用一个词来表达这个事情，比如说有人说是这是3.0的世界，或者因特网的世界。多年以来我一直想要用一个词来表达这个世界，和我的同事一起，希望能够表达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大数据的产生所以带来这些变化，所以我们决定写一本书，关于大数据时代的。”

维克托：拒绝大数据时代可能会失去生命

一句话恐怕不能算作耸人听闻，因为每当人

们站在现在这个节点的时候，总会去眺望未来，但是未来往往在你不经意当中已经悄悄地来到你的身边。在《大数据时代》一书当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大数据并不是一个充斥着算法和机器的冰冷的世界，人类的作用依然无法被完全替代，大数据为我们提供的不是最终答案，只是参考答案，帮助是暂时的，而更好的方法和答案还在不久的将来。

在《对话》使用宝利通远程云视频技术录制的“谁在引爆大数据”节目中，主持人问到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如果完全不认可大数据时代，如果抗拒它，我们会失去什么？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回答：“如果你是一个个人，如果你拒绝的话，可能会失去生命，如果是一个国家的话，拒绝大数据时代的话，可能失去这个国家的未来，失去一代人的未来。”

陈伟鸿又追问：“假设我认可了大数据时代终将来临，但是我认为这不是现在我需要去思考的事，因为可能是十几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以后的事，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又会失去什么？”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回答：“你会丧失享受的能力，会丧失让自己成为有用的人的能力。”

维克托：大数据时代因果关系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维克托提出自己的观点前，《对话》主持人陈伟鸿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前些天，我们到网上去买你的那本书《大数据时代》，打开网页之后，上面会显示相关的数据说，到今天有35%的人选择了你的《大数据时代》这本书，与此同时给出了另外一个推荐，你的另外一本书叫《删除》，55%的人上来之后买了这本《删除》，这个数据让我有点困惑，到底能够预示什么呢，两本书之间在销售上是不是有因果关系呢？或者说《删除》那本书写得比《大数据时代》更好一些？”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感谢您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其实马上就涉及到了大数据的核心问题。其实就人类来说，人类的文明历史也就几千年，我们以前的世界没有这么多信息、没有这么多数据，所以以前我们要做决策的话，往往没有办法通过数据帮助做出决策。为此，以前的人们开发出很多分析的理论，总是去寻找和分析因果关系。但是你要知道，尽管你可能分析出了一种因果关系，但是这种因

果关系很可能是错误的。比如说你可能去餐馆吃饭，然后过了几天，你觉得肚子不舒服，你就会想，肯定我那天去餐馆吃的东西不干净。更有可能你的肚子疼，因为跟一个同事握手，那个同事传染了你。所以人们总是想寻找一种因果关系。但是如果有大数据的话，你很可能找不到因果关系，你可能也不需要去找到因果关系。但是通过大数据的分析，

你能发现是什么？尽管你不知道为什么。比如说您刚才举的上网买书的例子，其实对于网络上面的书商，或者对您本人来说，55%的人买了《删除》这本书，因为他们觉得这本书更好呢？还是觉得那本书装订更好一些？其实‘为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什么’，他们发现网上推介有用，而且他们听了，‘是什么’足够了，不需要关注‘为什么’，这是大数据的一个核心特点。”

（上接第5页）黎争：“可能未来企业报表里面会出现一项，叫数据资产。现在有固定资产、品牌资产、现金资产，有可能未来会出现数据资产。有了数据资产之后，可能会延伸出新的模式，现在有股票交易所、期货交易所，未来可能会出现数据交易所，如果真出现数据交易所的时候，真正的大数据应用、广泛的应用，每个人、每个商业活动相关的时代就真的来临。”

CSDN 与《程序员》杂志总编刘江：“比如说，家里的酸奶或者标签，可以跟冰箱通讯，就能知道冰箱里有什么东西快没有了，它可以自动地把这些信息发给你附近的超市，超市可能会派快递员给你送过来。这样的话，我们个人自己的很多日常采购的行为更多变成快递公司的收入的方式。”

阿比：“我个人使用的业务模式就是基于位置的服务，我们讲到过，我们都使用我们的手机，我在大城市旅行的时候会获得具体的服务，比如交通服务，比如推荐给我一些餐馆的信息，因为我喜欢某种食物，我想吃印度餐，因为服务提供商知道我在纽约，它就会说建议我三个餐馆吃印度餐，所以这是非常独特的服务。另外一个例子，有很多应用提供 GPS 的流量信息，这个信息就可以当成传感器的网络，因为很多汽车都是在路上行驶，实时地把运输交通速度给了基站。现在有数千人是用用户，他们已经在路上跑，交通信息就非常的准确，哪儿堵车，哪儿不堵车，这是大数据时代另外一个应用。”

（2013年4月21日 CCTV-对话）

大数据时代

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机会

在4月21日央视播出的《对话》“谁在掘金大数据”节目中，走在大数据前沿的各位嘉宾们，对未来大数据时代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机会，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LSI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比 (Abhi Talwalkar)：“大数据时代会有很多机会，比如像对于 LSI 公司来说，它能够提供最基础性的技术，对每个人都能够有用。举一个例子，比如目前美国正在开展一些研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大概会在美国目前一亿五千万慢性疾病的患者家里，有远程的诊断服务，可以在家里面就能够享受到医疗服务。他们需要将自己医疗状况的信息发回到机构，医生从而能够实时分析，从而对他们进行实时的帮助，对症在饮食方面需要修改，不仅能延长人们的寿命，还能降低医疗成本支出。”

《IT 经理世界》出版人总编辑黎争：“思科在全球做了一千八百份样本的调查，主要是针对企业面 IT 专业人才做的调查，调查企业里面如何去应用数据，但是调查的结果不令人乐观，企业里面面对这些大数据究竟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价值，究竟对企业的决策，企业的运营有什么样的支撑，大家还是比较迷惑的，我想这可能是比较大的挑战。”

阿比：“是的，我同意。有很多公司现在的确实是收集了很多数据，但是他们还没有找到最好的方法，如何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怎么更好的利用。作为一个行业中的一员，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企业，了解他们收集的数据是什么样类型的数据，以及如何对数据进行挖掘，还有如何对数据进行利用，在这个领域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至顶网企业解决方案中心首席分析师张广彬：“大家想象一下，以前我们说计算，我们侧重的是计算，我说计算机，但是下一个时代大家想想，我们其实更多的重点会放在数据上，因为数据更重要，因为最后有了数据，你才能算，你才能最后得到你要的有用的东西。下一个时代关键是要把万世万物数据化、联网化，要先完成这个。阿比讲的医疗，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种病是非常罕见的，比如十万分之一的人得，好像非常罕见，但是大家想想，全世界 70 亿人，如果有十万分之一得，数量非常大，几千、几万人会得这种病，但是以前由于数据不能更多的数字化，包括集中起来研究，所以很难去把这个病攻克，但是下一步如果把各种各样的数据都能收集起来，而且集中起来，进行一些科学的分析，我们能很快的攻克很多以前想不到的科学难题。”

DCCI 互联网数据中心创始人胡延平：“一个人刚刚出生的时候，就可以对他的 DNA 做相关的检测，分析他潜在的一生会有什么病症。包括一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他每天健康的指标，比如心跳、血压、血糖等等，这些都可以被他随身所佩戴的传感器所记录，记录以后，对于整个医生的诊断来讲，是最好的电子病例。过去的电子病例，只有到了医院那一天做了相关抽血、化验等等，才可以建立电子病例。实际，现在电子病例变成每天每时每刻的过程。现在的医学跟数据的结合，其实已经走向很深度的方面，比如说对人体所有生理指标进行立体扫描，就是把人的立体化过程已经开始了，对个人的医疗健康特别有帮助。”（下转第 4 页）

LSI 的未来比英特尔的要好吗



在大数据时代。

LSI，一家名不见经传的非著名公司；
英特尔，大众公认的互联网行业巨头；

两家公司都是全球的芯片生产商。但我们所熟知的全世界最牛的芯片就来自于英特尔，两家看似水平不在一个层级上的公司对垒，谁才是未来的赢家？

LSI 非著名 CEO 阿比有话要说！

阿比：“进入 LSI 以前，其实我在英特尔的责任已经很大了，我和另外一个英特尔的同事负责英特尔的 65% 的业务，所以我们的责任已经很大了。进入 LSI 之后，我记得在 2005 年的情况，那时 LSI 没有明确的战略，LSI 无处不在，到处进入不同的市场，在很多市场当中并不是第一和第二位，只是有一些规模，但是缺乏重点、重心，我用了 90 天和每一个人进行沟通，和每一个客户进行沟通，和董事会的成员进行沟通，和高管人员进行沟通。同

时，我也开始评估每一个业务单元。然后呢，六个月之后就设定了一个蓝图，这个蓝图就是让这个公司更加关注存储和网络，因为那时候我们预测，世界将会更快的创造更多的数据。

阿比：“是不是 LSI 的未来比英特尔的未来要好呢？我觉得我们的市场，我们的基础是基于我们的应用的。作为这个社会，我们现在每一天，每一秒钟都在产生更多的数据，所以市场的基本面很好，这个社会不断地产生更多的数据，LSI 就会存储这些数据，我们就会做得非常好，LSI 很有用。很多公司，在电脑行业所面临的挑战，比如英特尔。电脑行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现在我们买了手机，或者是买平板电脑，就会对电脑市场发生很大的影响。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吧，在一个电脑当中，会有一个头脑，主头脑就是英特尔的芯片。但是还有一些功能，比如说存储这个功能，也就是你的数据内容和数字信息存储在这儿，在存储当中，就是另外一个品牌，那就是 LSI 的芯片在这里，英特尔和 LSI 是在电脑当中共同发挥作用的，在服务器当中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是同时存在的。我们不是相互竞争的，我们是发挥不同职能的。所以对英特尔会是很大的挑战，其它公司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LSI 我们获益，因为这个世界每一秒钟都在产生更多的数据。

（4月18日 CCTV-对话）

CHINA ECONOMY & INFORMATIZATION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

阿里“玩”大数据



阿里怎么“玩”大数据

当大数据开启一个时代时,拥有海量交易数据的阿里巴巴,已经认识到这是一座富矿,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

500多年前哥伦布做环球航行时,最想得到的就是航海地图,要不然他不会把美洲大陆当成印度。

当大数据开启一个时代时,阿里巴巴集团(下称阿里)从海量交易数据中挖掘有价值的信息,犹如在大海中航行,马云的鸿鹄之志也是那张航海地图。只是哥伦布的目的是印度,马云的目标是大数据。

马云宣称平台、金融和数据是阿里未来的三大战略方向。其实,“阿里未来本质上是一个数据公司”,电商越来越离不开数据,金融的核心也是数据。阿里设立首席数据官,并把首席数据官陆兆禧升任 CEO,传闻将收购移动 APP 数据公司友盟等,这些都显示马云的大数据战略萌动生芽。

在几乎全球所有公司都还徘徊在大数据门前时,马云纵然有大数据的宏伟战略,在具体操作层面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完成 25 个事业部战略调整后,阿里巴巴成立了数据委员会,由淘宝网商业智能部负责人车品觉出任首任会长。这位曾经在微软、ebay 出任产品经理,在支付宝、淘宝主管数据业务的香港人,大半生都痴迷于数据迷宮。

“我之所以来淘宝就是喜欢它的数据,就希望好好梳理下数据。”车品觉谈到数据时异常兴奋,在接受《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 3 个小时采访后,他还要给同事做有关大数据的培训。此时,已经是晚上 10 点多。

车品觉是马云大数据战略棋局中已经

过了河的卒子,他肩负着为阿里寻找开启大数据之门钥匙的重任。马云给了他异常宽松的工作环境,甚至没有具体的 KPI 考核。在接受《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采访时,他对所谓大数据赢利模式之类的问题并不看重:“阿里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愿意尝试不同的产品,连领导都不能控制手下人到底玩什么。一带很爱数据的人玩一堆产品出来,偶尔能出现如阿里金融这样的产品就很好,允许他们玩就是允许差异化,做数据如果急于现在赚钱就会失去机会。”

“玩数据”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特别是车品觉出任阿里数据委员会的安全责任人之后,他每时每刻都处在忐忑不安中。他认为,今后一段时间,数据质量、数据安全以及数据化运营将是阿里必须翻越的三座“大山”。

从“淘数据”起步

2003 年的淘宝还是个“小朋友”,一个不起眼的购物平台,远不如当时的易趣(eBay)名气大,甚至还有人预言淘宝会在 18 个月内夭折。

18 个月,淘宝让预言夭折了,淘宝交易量几乎呈指数增长,在 2006 年上半年注册用户数超过了易趣。从某种程度上看,易趣的存在是淘宝数据业务起步的外部动力。为了与易趣的销售对比,淘宝开始搜集每天的成交额、用户访问数

等数据，从起步就增强了对数据的粘性。

淘宝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个数据产品是“淘数据”，说白了这就是一个经营数据报表。“每个公司都需要了解经营业务状况，淘宝业务大了也需要看经营状况做未来决策，‘淘数据’就是为内部报表服务的一个工具，大约是淘宝成立两年后的2005年开发的。”淘宝商业智能部一名元老级数据分析师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

这一年，淘宝迎来第一个数据分析师。半年后，淘宝建立第一批数据分析师队伍，并成立第一个数据部门——商业智能部（BI）。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日成交额、访问用户数等数据统计之后放入报表，让淘宝决策层能够清楚了解业务状况。

此时的淘宝不再是一个卖家挂货、买家购物的购物平台，开始关注数据产生出来的意想不到的价值。当然，马云当时还不至于把数据提升到公司战略高度，但他敏锐地发现，“数据非常重要，未来的世界是数据的世界”。

外界广为流传这样一个故事：2008年，中国众多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重创，而阿里根据买家询盘数急剧下滑，及时向中小制造商提供预警信息，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做好准备。虽然车品觉把这次经济预警归结为偶然事件，但阿里确实在数据分析中尝到了甜头。

随着数据越来越多，原来的处理方式已不能进一步扩展，淘宝在用传统数据库方法处理数据问题时遇到了麻烦。

“我们早上9点上班要看数据，但传统数据处理技术很难在9点之前让所有人看到结果，数据处理的时间成本非常高。再这样发展下去，就扛不住了。”前述分析师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

这一问题触发了淘宝第一次技术层面的架构变迁，把以Oracle为主的传统数据库迁到了大数据技术Hadoop数据库上，正式开启阿里的大数据实践应用。

两条腿走路

淘宝的数据视野并没有停留在公司内部决策上，2009年数据应用与开发开始走向外部，让淘宝商户分享数据。

在这一背景下，淘宝商业智能部的一部分人“被赶了出来”，开发淘宝商户能分享的数据产品。这是淘宝的一次大胆尝试，进行技术架构调整后，为挖掘更多有价值的数据腾挪出了空间，让数据变成产品为公司挣钱。当然，此时淘宝并不是从挣钱的角度开发数据产品，而是想整合数据为商户提供优质服

务。2010年3月，淘宝“数据魔方”产品正式对外发布。麦包包箱包在线商城是首先接触并尝到“数据魔方”甜头的商家。麦包包运营总监毕志鹏称：“在‘数据魔方’提供的数据支撑下，麦包包能及时准确把握市场动态，销售业绩迅速提升。”随着淘宝数据正式对外开放，越来越多商家、企业能分享淘宝的海量数据，并获得有价值的数

据支撑。几乎同时，淘宝内部对数据的需求也日益强烈。商业智能部留下的团队继续为公司内部提供数据支撑。此时“淘数据”开始从单纯的报表系统扩展为内部数据产品的统称。2009年4月和12月，商业智能部团队又开发出可以预警的“KPI系统”和提供给业务部门使用的“数据门户”。一年后，为了配合淘宝的大促销活动，便于及时查看实时数据，这个团队又开发了“活动直播间”。为了让卖家更好地运营，2011年2月，“卖家云图”出世。2个月后，“页面点击”诞生，它可以监控每个页面的每个位置，用不同的数字和颜色标注出页面点击情况。

此时的车品觉在阿里已经拥有良好口碑，“要数据找车品觉”成为惯例，很多管理层都习惯了车品觉提供的数

据。时任阿里首席人力资源官的彭蕾找到车品觉

说：“马云觉得该考虑一下如何从数据运营转到运营数据了，你回去好好想想这个事情。”

“黄金策”是车品觉较为得意的一个能称得上运营的数据产品。车品觉带领团队处理了1亿多活跃的消费者数据后，拿出500个变量，只要2秒钟就能计算出结果。“黄金策”最早在支付宝成型，现在在与淘宝数据对接。

“支付宝发展大数据的目的，跟淘宝系有点偏差。支付宝更多是为内部服务，淘宝和天猫更多强调商业化。”车品觉如是说。2012年年中，车品觉来到了淘宝。时任淘宝网 CEO 的姜鹏邀请车品觉同时兼任淘宝商业智能部负责人，之后车品觉又成了阿里巴巴集团层面数据委员会的首任会长。

车品觉很看重淘宝的数据，因为淘宝数据更丰富，不仅有业务数据（交易行为数据），还有过程数据（如一个买家在某个页面上停留了多久等）。在他看来，淘宝的这些数据就是 SNS 关系数据，这种数据脉络看起来很像社会关系，并非一般 B2C 模式可以比较，这对他特别有吸引力，套用马云的话这叫做生态链。

来到淘宝后，车品觉相继开发了两款产品——“无量神针”和“类目360”。通过“无量神针”，淘宝的管理者可以辨别萌芽状态的可疑行为，迅速做出决策。而“类目360”则把淘宝的类目做得非常细，如果销售增长了10%，可以知道是哪一类目，哪一部分用户对营收增长贡献大，能评估集团内部哪些人工作效率，哪些部门不给力，让管理层2秒钟就知道如何决策。

之后，淘宝有了自己的“黄金策”，锁定用户群后，可以立即对这些用户进行针对性营销，营销后的效果又会回到“黄金策”上，形成一个闭环。

比车品觉团队开发“黄金策”稍晚，淘宝对外团队研发了“淘宝指数”，这是一款中国消费者行为数据的研究平台。无论是淘宝卖家还是媒体从业者、市场研究人员，都可以利用“淘宝指数”了解淘宝搜索热点、查询成交走势、定位消费人群、研究细分市场。

在这段时期，阿里一直在用两条腿走路，对外团队为外部服务，商业智能部服务于内部。

2012年阿里又推出了“聚石塔”产品，这是阿里首次联合全集团大数据力量打造的一款大数据商用产品，可提供数据存储、数据计算两类服务。

“聚石塔”平台没有辜负马云的期望。据天猫 CEO 张勇透露，“双11”狂欢节大促当天，“聚石塔”处理的订单超过天猫总量的20%，比平时增长20倍。

“聚石塔”上的客户不仅包括淘宝上的商家，也包括淘宝外的电子商务企业。在淘宝和天猫平台上，有 ERP 系统（企业资源计划系统）的商家可以直接找天猫对接“聚石塔”，没有 ERP 系统的商家，可以找提供第三方软件服务的电子商务服务企业，通过他们的 ERP 服务接入“聚石塔”服务。

数据平台战略

大数据部门该放在运营团队还是技术团队？这是车品觉经常被其他公司询问的一句话。听到这个问题时，车品觉就觉得“这些人没戏了”，因为他们并不重视大数据战略。

在车品觉看来，一个企业如果真想做好大数据，大数据必须成为 CEO 直接领导的一级战略部门。如果数据部门想要在结构庞杂的企业内部提高地位，数据产品一定要刺激决策部门和业务部门，直至促使他们对前端的业务环节做出调整。

2013年1月，阿里调整为25个事业部，CEO 陆兆禧分管的数据平台事业部团队正是“数据魔方”衍生出来的团队。而在数据平台事业部很得力的员工空无（淘宝员工的化名）就是当年做“数据魔方”走出来的人。

在数据战略架构上，阿里早在3年前就开始布局。2010年阿里推出一淘网，目标是做一家全网购物搜索引擎。2011年淘宝收购 CNZZ 网络技术服务公司，第二年 CNZZ 推出“云推荐”内容推



荐引擎。淘宝联盟在今年重启“阿里妈妈”品牌名,从以服务淘宝系商家为主转为面向全网所有广告主。阿里与新浪微博仍在进一步谈判,近期传闻阿里将收购移动开发者服务平台友盟等。

早在阿里酝酿设立首席数据官岗位(CDO)前,马云就意识到数据产品要建在一个平台上才有更大的价值。2012年7月,阿里委任陆兆禧为首席数据官职务,负责全面推进阿里“数据分享平台”战略。

事实上,马云希望建立囊括所有与消费相关的数据平台,包括实体类商品消费数据、服务类商品消费数据、金融相关数据等,再以自己的数据平台为中心建立数据交易中心。也就是说,谁想获得数据,上这个平台来,要么用货币来换,要么用数据来换。

阿里金融是大数据衍生产品开发的一个范例,通过分析淘宝、天猫、支付宝、B2B上商家的各种数据,阿里打造了一个信贷工厂,为平台上的卖家提供小额信贷服务。

马云这步棋下得很准,小微企业的资金困境影响着企业的发展。目前,中国有近4200万家小微企业,在影响企业发展壮大的因素中,资金

占96%,银行考虑到风险太大,很少向小微企业贷款。那么,阿里金融如何通过大数据规避风险呢?

除了容易标准化的交易数据外,非结构性数据也一并被录入到数据库中,类似卖家和买家的聊天记录、评价、店铺信用等。然后,阿里金融通过数学模型,对上述数据分析处理,就能自动确定贷款申请人的贷款限额。发放贷款以后,阿里通过实时监测贷款商家的交易、退货、评分等经营情况,能方便了解客户还款能力,一旦客户交易情况下滑,系统会自动发出预警。

这就是阿里金融打造的一个纯粹基于互联网信用小额信贷的平台。截至2012年底,阿里金融累计服务小微企业已经超过20万家。同年11月初,阿里金融的坏账率仅为0.9%,低于很多银行。

让爱数据的人玩起来

“今年你给我的绩效是什么?”

“你开心就好。”

这是阿里数据委员会成立后,车品觉和姜鹏的一次对话。不过,车品觉想开心并不容易。他的担心更多于开心。

车品觉的担心是有理由的。阿里数据委员会是一个虚拟的组织,虚拟如何管理实体?“有点打太极,四两拨千斤的感觉。”车品觉苦笑称。

2013年在香港特区过新年的时候,车品觉想办法让自己尽量休息。他知道今年数据委员会的工作肯定会千头万绪,他要筹建数据挖掘工程师、分析师等协会,为大数据业务培养足够的人才。他告诉记者:“数据人才是最大的竞争力。我今天看大数据的时候,是如何让他们玩出来,而不是把人管理起来。”

在阿里的大数据团队中,有这样一批人:决策分析师、业务分析师、数据挖掘工程师、数据科学家、数据产品经理、数据开发者、基于数据的前端开发工程师、数据底层平台搭建师。车品觉的想法

是让爱数据的人玩起来：“我们相信只要这样走下去，会有一帮懂数据的人玩出来。我们要找到出路，但是不一定现在就能明确看到出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邀请数据科学家来，很多事情不能说今天就要效益，偶尔能产生阿里金融这样的产品就很好。”

车品觉对数据分析师的考核有自己的标准。每个月的最后一周，数据分析师都有一场考试。如果分析师的观点能在月度经营分析报告里出现，就说明这个分析师的分析有价值。如果在报告提交给管理层讨论的时候，某个分析师的观点能改变业务部门领导的看法，那就得到 3.75 分。更进一步，如果分析师的观点能让公司领导接受，并最终促进相关业务的调整，那就是 4 分。4 分几乎是一般数据分析师能得到的最高分。

“数据的数据”

一次大数据会议讨论中，车品觉向姜鹏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做数据的人，为什么没有数据的数据呢？正是这次提问，淘宝开始着手建立“数据的数据”，即数据地图。“每一个数据都由很多数据产生，数据的数据是让我们看见今天数据做得怎么样，建立数据地图，以追溯到数据的源头，提高数据的质量和价值。”车品觉说。

保障数据质量要在大数据源头获取方式上下功夫，从源头上保证数据的准确度。“就好比去挖掘一个信用卡持有人的消费记录，必须清楚这些消费行为是不是都来自持卡人，有没有可能部分是持卡人老婆去消费的？”车品觉表示，要尽可能保证数据的精确度，不然会导致数据质量失准。

大数据跟个人最为密切的关系是对隐私的可能侵入，数据安全是阿里大数据面前的第二座大山，也是第二大核心。“有些人不知道数据的危险性，但我们做数据的人深知其中的利害。数据安全得不到保障，早晚出事。”车品觉说，为了数据安全，

他在支付宝里可能得罪了不少人，“但个人隐私绝对不能泄露，这是底线”。

目前在阿里内部，淘宝系的淘宝、天猫和一号，在数据上是共享的，B2B 的数据则是独立的。支付宝有金融牌照，法律要求数据必须独立，如果集团某个部门需要一些数据，查看数据必须提出权限申请。

事实上，车品觉刚开始做安全的时候也失败过。那时候，他第一次建支付宝的安全架构，直接套用了银行的一套物联网安全架构，“我想定义所有数据的层，做完就进行不下去了。”在支付宝第二次做安全的时候，他采用 case by case（案例法）这种方法，然后成功了。现在在淘宝，他也使用了案例法，慢慢积累安全经验。在他看来，安全是开放的前提，如果国家未来想到管理数据，在阿里的经验将很有参考价值。

为了保证数据安全，车品觉的团队在研究用户行为时，框定的最低数据量是 1000 人用户群的购物行为，不能再少于这个人数，针对某个具体用户的数据分析是不允许的。车品觉说：“阿里对数据的挖掘处理有一套自律准则，包括后台数据的查看，一些明细是看不到的，这样封闭的目的在于维护用户的隐私，同时也防止数据滥用。”

阿里内部还专门成立了小组，数据的公开与否主要由他们进行判断。评判小组没有一个具体统一的标准，数据该不该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都以每个案例本身为依据。

到今天为止，数据委员会里的安全小组跟数据质量小组已经成立，相比年初时，车品觉的心沉下来一点了。“数据开放现在太早了，度很难把握。”车品觉说，在某种程度上，数据开放考验的是数据人的良心和经验。

阿里还在路上。车品觉和同事现在所走的路是一条很新的路，可参照的东西不多，从国外公司来看，拥有阿里这个数据量级的公司并不多。在大数据的路上，阿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4-25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

郑永年： 改革， 能跟上 社会变化的 速度

“新政府的三大方向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监管型政府、向社会分权。其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执行。我个人的担心是，执行如此之难，而社会的期待越来越高，那么改革的速度是否能跟上社会的变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是长期观察、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尤其是中国的政治转型方面的权威。他身在海外，以局外人的身份与目光洞察中国社会，其观点与建言受中国官方的重视。在中国新政府成立之际，郑永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对新政府及其未来政策走向、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发表了看法。

中国新闻周刊：据你观察，新一届政府的人员构成有什么特点？和往届政府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

郑永年：构成这届政府的人员，可以说是专家型，他们的学历普遍比往届政府官员的学历高。此外，他们的工作经验比以前的官员要丰富，基本上都有在中央、地方（包括在不同的地方）的工作经验。

选拔领导人的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有关系，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要求。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要实现工业化，所以需要“技术官僚”，选拔干部就侧重工程、技术背景的官员。如今重点是社会改革、社会建设，要进行政治改革了，那么就需要具有文科背景、法律背景的官员。



中国选拔党政接班人已经制度化了，这是在邓小平掌权以后慢慢发展而来的。因为逐步制度化，目前就已经比较正规，在选拔中会比较注重官员各方面条件的平衡，比如文科、理科知识背景的平衡，有内地工作经验和沿海工作经验的平衡，等等。

新政府可以称为专家型政府，从人员构成来看，文科背景比较平衡。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本届政府而言，未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郑永年：我认为社会改革当然是主题。这方面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涵盖政治、社会、经济领域。现在的政府要转型成为服务型政府，那么，就要推动公共服务，在社会保障、尤其是医疗和住房方面多做工作。李克强这几年也一直在强调政府在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问题。但是，要提高公共服务，就要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要配套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的二三十年，改革的主体是经济改革，而现在，我认为本届政府的主攻对象是社会建设，包括社会制度建设。但是社会制度建设是需要有钱的，需要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发展是引导力，没有发展的话就很难提供公共服务。同时，要真正提供公共服务的话，就需要一些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的先决条件，就要克服既得利益。

这个问题非常难，但政府不得不做。关于既得利益，大家说了很多年了。并不是说，改革就是要消灭这些既得利益。事实上，既得利益任何社会都有，

没有一个社会是没有既得利益的,关键在于如何克服它的阻力,真正让更多的民众受惠于经济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如何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

郑永年:我一直主张,中国是不可能消灭既得利益的。在这方面,邓小平的策略就非常重要;要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用新的利益来克服老的利益。邓小平开启改革时,城市的既得利益已经较大,他就先把改革放在农村。改革开始后,他发现国有企业既得利益很大,但他并没有把国有企业给减掉,而是在国有企业之外培养非国有部门,包括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成长了以后,就对国有企业产生很大的压力,那个时候改革国有企业就相对容易了。改革国有企业成本高,但有了民营部门,就可以消化国有企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吸纳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

就以中国的金融机构为例:很多人说,国有银行私有化是不可能的,那么,既然国有银行改革不动,那能不能让民营金融机构成长起来呢?中国的民间金融其实蛮强大的,只是一直处于非法的地下的状态。这一块力量,是可以培养的。

要记住,既得利益都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为什么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领域,那是因为2008年以后把4万亿都给了它。中央政策可以培养出这样一个既得利益,也可以培养出新的既得利益与之抗衡。所以,不能简单地谈既得利益问题,因为既得利益任何社会都有,既得利益也是社会稳定的一种需要,毕竟如果社会没有利益,大家谁也不负责任。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出新的利益来,这个非常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培养新的利益群体,就得有一个开放的体制,这似乎就要涉及政改了。

郑永年:中国的改革过程就是这样: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农民是主体。改革开放后,出现一大批民营企业企业家,这使得中共去改革它的政治体系,比如允许民营企业家人党,这就是很大的改革成就。然后又去修改宪法,制定物权法,等等。现在进行大部制

改革,就是要分权给社会,让社会力量成长起来。体制不能够封闭起来,必须开放,向新的社会阶层开放,这样,新的利益就可以产生,新的利益就可以进入到体系中,这是一个政治过程,是新的利益和老的利益互相讨价还价的过程。

当年,中共允许民营企业家人党,就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创举。民营企业家人进来后,在党内能不能发挥作用?党内民主应该怎么做?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现在,要发展大社会,大社会就是让非政府力量来主要参与,他们成长起来后,就可以进入人大,或者可以在政协增加他们的名额。这就形成一个开放的政体。

政改其实一直在进行。我上面所说的民营企业家人党,就是政改。以前,没有农民工担任人大、政协代表,现在有了。当然,他们的数量还很少。那么,今后可以多增加他们的席位,这是制度允许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体系必须是开放的,有一个开放型的政党制度,不同的新的力量就会参与进来。

中国新闻周刊:回到新政府话题,你觉得本届政府会在改革方面会有什么作为?

郑永年:两会上提出了机构改革方案。新政府的调整,几个大方向基本明确。一是政府向规制型政府发展。其职能转向监管企业、监管社会。像食品、药物这些企业都需要加强监管。反腐败方面,实际上就是中共要在党内加强对干部的监管。二是继续构建服务型政府。这个事情说了很多年了,这届政府还会继续做。三是向社会分权。

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把社会管理的功能移交民政部,提高民政部的社会管理功能。在这方面广东的试点做得比较好,现在要向全国推广广东的经验,分权给社会。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政府向企业分权。如今,要实现大社会管理的话,首先要向社会分权,让社会成长起来。

但是,向社会分权并不等于不管社会了。中国在过去已经犯了一个错误——政府把权力下放给企业,但是它没有建立起对企业的监管制度,所以才造成类似毒奶粉、毒食品、矿难这样的问题。政府把企

业当作经济的主体,就必须具备监管的功能,这是政府的责任。因此,现在政府一方面把权力分给社会,但同时要考虑怎么去监管社会。如果这部分的功能缺失,邪教、恶势力、黑社会就会趁虚而入。政府的监管,就要依靠法治。所以,同时要推动法治。

中国新闻周刊:按你的说法,新政府的三大方向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监管型政府、向社会分权。在这方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郑永年:我认为是执行,包括执行的力度。这些年,改革的步伐慢了一点,但总体方向还是对的。在我看来,向监管型、服务型政府发展,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而所谓的步伐缓慢,是指在向社会分权方面,这个步伐还是不太敢迈出去。步伐不够大,太慢。

中国新闻周刊:反腐显然也是新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你对当前反腐的步伐和方向有什么评价?

郑永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说了,苍蝇老虎一起打,显示了一种决心。

在我看来,中国的腐败问题是很大面积的,怎么清算呢?如果发动一个毛泽东式的反腐败运动,第一不可能,第二有害于法制建设。我认为,依据法制反腐最重要,一定要避免运动式的反腐败。比反腐败更重要的是,要给“清算对象”一个机会。因为现在中国的腐败是系统性的腐败,往往并不是每个人都想贪污,但可能想清廉的人都没有空间也没有机会。所以,要在腐败的系统之外,设计出一个不腐败的系统来。

这方面就需要顶层设计。我曾经建言,要设计一个“大部级”的反腐败机构。中国的反腐机构太多了,党有几块,政府有几块,人大,乃至学校里都有反腐败部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这样做的。这是一个集权的系统,却没有一个部委级的机构负责反腐败,大家互相推诿,反而给腐败很多的机会。有时候,甚至反腐败机构本身也变得更腐败。

所以,要把体制内部的一些反腐败的机构整合起来,一定要设立一个大部级的反腐机构,主管这方面的工作。同时要向社会分享权力,让社会来配合、监督反腐。

中国新闻周刊:你之前提到社会管理问题。当前社会矛盾较尖锐,如何通过社会管理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郑永年:在维稳方面,这几年有了一些变化。以前也在说,要以社会管理来补充维稳。如今要进一步加强社会管理在维稳方面的功能,这个方向很清楚。以前,把社会管理这一块放在政法委,这是不对的。因为政法委是管理坏人的,是管理、惩罚犯人的;而社会管理是管理好人的。你用管理坏人的方式来管理好人,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就会滥用暴力,就谈不上维稳了。现在把社会管理这一块从政法委切割开,放到了民政部。我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

不过,把社会管理工作放在民政部,但没有加强民政部的职责权力,只是把社会管理狭义地理解为社会工作的话,民政部还是相对弱势,那就没意义了。就会变成类似于香港的慈善组织。所以我认为,如果把这一块职能划分给民政部,就需要有一位副总理级的官员来专职负责这项工作。

这次的机构改革中,民政部扩权是幅度较小的,所以我会有些担心。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习李新政”,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经过了一个“政治年”,先是中共十八大,后又有两会政府换届。十八大着重于政治,确定了方向,而两会就是在国家层面考虑如何去做的。总体上来说,我觉得方向是对的。目前,中国要进行非常激进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但改革一定要有步骤地展开。过去的改革,很多是粗犷型的改革、粗犷型的发展,而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改革的规划确实要更精细一些,要开始注重细节。

关于改革的实施,最大的担心还是说到却做不到。习近平也强调过,重在执行。而我个人的担心,是执行如此之难,而社会的期待越来越高,那么改革的速度是否能跟得上社会的变化?换句话说,中国的改革,是在和社会的变化赛跑。

(2013年第10期《中国新闻周刊》)

我接受了

廉政公署的约谈



香港肃贪有成效，原因何在？廉署的独立和自律；传媒独立监督；议会监督

如果碰上标题党，这标题会被做成“我接受了廉政公署的调查”。还真是调查——2010年廉署民意调查，全香港有1500位市民接受约谈。我好奇的是，在我所住宿舍数百师生中，电脑随机抽样为什么偏偏抽到了对ICAC（廉政公署）饶有兴趣的我。

10月12日，我收到廉政专员来信。信中说：廉政公署现正委托MVA顾问有限公司进行意见调查，探讨市民大众对香港贪污问题的看法。访问员均会出示由廉政公署发出的访问员委任信以及工作证（为帮助识别，随信还寄来工作证样本）。

两天后来访的是一位中年女士。她取出厚厚的问卷，第一个问题是“你对贪污的容忍度”，从0到10，10代表完全容忍，0代表绝不容忍。我的回答：0。她接着问：为什么？我脱口而出：反腐倡廉，香港是榜样，这个榜样不能倒！

接下来问的还是容忍度，但问题渐渐复杂。她列举6种情形，答案集中到5级：绝不接受，不接受，不太接受，勉强接受，完全接受。1. 大厦业主立案法团主席收受维修承办商利益；2. 公司买手（采购员）收受供应商回扣；3. 推销员为多领佣金报大营业额；4. 食品与环境卫生署工作人员收受酒楼老板贿赂；5. 扫黄人员收受色情场所老

板贿赂；6. 公务员在未申报利益的情况下，将部门工程合约判给亲友，但个人并未收钱。“绝不接受！”我给清一色答案。但她追问为什么，我却要稍加思索。我具体设想了6种不同的情形，一一作答，理由不外乎涉及公平、正义等等。例如最后一道，公务员徇私，破坏的是公平竞争；他未收钱，也不可饶幸，况且可能获得潜在、长远的利益。

问题步步深入。访问员问我对香港贪污问题的总体看法——非常普遍，几普遍（较普遍），唔系几普遍（不很普遍），还是非常唔普遍（非常不普遍）？在过去12个月，遇到什么贪污事件？你的亲属有没有遇到？你认为未来12个月的贪污趋势如何？增多？减少？持平？哪一行最容易滋生贪污？香港肃贪有无成效？

有成效，我说。访问员紧追不舍：原因呢？我答三条：廉署的独立和自律；传媒独立监督；议会监督。

我已经不能脱口作答。我发现这不是一般的访谈，是一次脑力激荡。访问员在问我，我更想问她。最后答“如何加强廉政公署的工作”，几乎变成政策研讨：关于监督地产霸权；关于监督跨境官商勾结；关于对学生的倡廉教育；关于如何利用新媒体进行宣传（我批评廉署网页内容单调）……“可不可以利用最新的传媒报道来进行举案说法呢？”我问，“比如，（下转第20页）”

外国共产党人 怎么看中国



英国马列主义共产党主席布拉尔说，中国，中国应该成为全世界为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奋斗的人们的灯塔，就像它1970年代所做的那样，这是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承担的责任，它将使中国的声望高扬天际。

“新兴国家崛起必然遭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抵抗，战争不可避免！”

同声传译讲完这句，会场一片窃窃私语。演讲者皮肤略黑，却是欧洲人的轮廓，当翻译讲到中国崛起与西方衰落形成鲜明对比时，滞后的掌声让他有些猝不及防，用以加强语气的右手僵在了半空。近二十分钟的演讲结束后，主持人迅速卸下耳麦，凑近话筒说，“感谢布拉尔同志。”

“同志”，听众似乎没感到不协调。作为英国共产党（马列）主席，茶歇一开始，西装革履的布拉尔立刻被几位中国学者围起来。有人和他热情拥抱，也有人争辩说他的判断太过惊悚。但布拉尔一再警告，帝国主义仇恨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

这是2012年11月一个寒风凛冽的上午，中国社科院报告厅里，来自美国、法国、加拿大、尼泊尔的共产党人陆续上台，演讲中充斥着诸如帝国主义、列宁、剥削、反动之类的词汇，但从他们的语气和手势当中，你能感觉到充沛的热情，甚至是忙于挽救的焦急。

一群外国人，不远万里带来研究成果，准备了数十页演示文稿，在中国的讲台上反对自己的政府，为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出谋划策。演讲只安排15分钟显得吝啬，他们无一例外超时了，“世界社会主义论坛”的午餐时间被迫推后一个多小时。

相比于演讲者的热情和以往的话题——这里曾发布过房地产、消费、贫富差距、政治参与等各类报

告，内容现实直接、烟熏火燎，足堪挑动公众神经——当天的话题是“资本主义危机与社会主义未来”，看起来有些冷僻，几乎没什么媒体同行到场。

根据中组部党建研究所的数据，目前世界上有一百二十多个以共产党命名或宣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它们秉持怎样的政治纲领？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共产党的坐标中，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道路？

“别纠缠中国”

在伦敦西部的印度裔社区，一栋三层小楼里混合了朝鲜、古巴、中国的装饰元素，会议室将近一百三十平，即使全部党员同时开会也绰绰有余——这是布拉尔的英共马列总部。

2008年7月，布拉尔在这里发起了“别纠缠中国（Hands off China）”运动。近五十名党员坐在会场里，听布拉尔声色俱厉地演讲，四周墙上悬挂着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的画像，以及以天安门为主题的红色招贴画，俨然1990年代中国西部某县党委会会议室。

你当时为什么发起这个运动？

“帝国主义媒体肆意攻击中国，做得太过分了！”布拉尔向我讲述2008年4月北京奥运火炬在英法等国传递时遭遇的抢夺和破坏，他说自己和中国人一样，义愤填膺。

“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我们必须公开地、毫不含糊地为中国辩护，驳斥那些欧洲、美国和日本媒体散布的谎言，我们的努力相当成功。”

至于怎样个成功法，他没有详谈，只是说，“别纠缠中国”博客正抓紧升级，很快就能完成，“一旦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媒体又恶意攻击中国，就准备曝光它们在亚太地区的劣迹！”

2008年7月间，“别纠缠中国”运动在国内被大量报道，和揭露“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文章一样受人欢迎。在中国记者远赴英国拍回的照片里，布拉尔神情愤怒地站在一面红墙前，背后挂着“马恩列斯毛”的标准像。

布拉尔是印度裔，身材高大，须发皆白，讲起话来有种不容置辩的气场。他阐述的观点似曾相识，比如，就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啦，因为你挡了美国霸权主义的路啊，占了帝国主义者的“禁猎区”，诸如此类。总之，“不是中国做错了什么事。”

如果就此以为布拉尔对中国处处认同，那就错了。在谈及中国的贫富差距和腐败问题时，他坚称都是“市场惹的祸”，并认为中国必须制止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扩张，及时调转方向，清除资本主义成分。

不止这些。“美帝国主义正准备跟中国打一仗，好独霸亚洲，中国可得注意了”，“市场经济削弱了你们的民族精神”，“市场在中国的扩张正持续地呈现在西方媒体上，被当作资本主义不朽的证据”……“布拉尔同志，你的观点有点吓人。”

其实，在英国众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英共马列可谓最“激进”的一个。英国目前存在大大小小二十多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其中英国共产党、新英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劳工党和英国革命共产党规模稍大。

2004年前后，布拉尔还是社会主义劳工党的一员，但到了7月，社会主义劳工党内部的思想分裂激化，布拉尔一派与党主席斯卡吉尔在很多问题上谈不拢，他指责后者反对朝鲜“拥核”是要让它变成下一个伊拉克，还说他对马列主义不够热忱。最终，在争执、谎言和咆哮中，布拉尔“另立中央”，成立英国共产党（马列）。

从此，布拉尔把“英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仙境方案”抛之脑后，以党主席身份成为朝鲜劳动党的座上宾。

“我知道你很惊讶，但我是真诚的，共产党人从来不会隐瞒自己的想法。”布拉尔说。

“高扬天际”

等到国内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发言时，我才注意到会议手册对“世界社会主义论坛”的介绍。论坛在2009年10月的重庆首次举办，那时“唱红”轰轰烈烈，没多少人注意到它，一百余名中外学者入驻的北碚区海宇温泉大酒店，也还没有因为雷政富而声名鹊起。

美国共产党员瓦迪·哈拉比对那次世界共产主义学者的团聚印象深刻，与会者不仅同意“要继续振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在重庆市委宣传部的安排下，夜赏嘉陵美景，“霓虹闪烁，江风轻拂”，哈拉比形容说。

如今，重庆唱红已经偃旗息鼓，论坛主持人、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立强感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国内的国际共运研究也十分寥落，仅社科院还设有专门的研究中心。

布拉尔对此感同身受。他于1962年前往英国，1996年放弃了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法律学教职，投入职业政治活动。他的英共马列2004年创建后党员人数维持在百余人左右，日常开支仰赖党费，每次开展活动则需另行募捐。布拉尔说，“钱不是问题，关键是人员，只要有人就会有资金。”

为扩大影响，一些共产党转而鼓励党员加入工会。布拉尔承认，工会也对共产党组织没兴趣，这与60年代的形势大相径庭，“哎呀，总之我们境况不好。”

在美国，共产党仅有党员3000人，那已是美国左翼政党中最大的一个，此外还有一个美国革命共产党，主张暴力革命，响应者寥寥。

美国人为何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据说是一个挺热门的学术话题，影响比较大的观点认为，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高于欧洲大陆工人，因此安于现状，不倾向社会革命。国内秦晖教授的解释是，“不患寡而患不公，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

虽然如此，瓦迪·哈拉比却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新特征蕴含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的观点被中国学者多次引用。

哈拉比是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心（相当于社区学校）的一名讲师，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的普通委员，但他在中国却极受欢迎，连日共副委员长、法共中央委员都难望其项背。

“因为他是美国人啊，”社科院一位青年学者倒觉得不足为奇。从2000年开始，哈拉比先后在中国的顶级学术机构中国社科院、中央编译局设坛讲学，在众多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访问，其理论文章被当作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成果译介和引用。第三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期间，若非妻子突然染疾，他原来要在中国呆上20天。

美元与人民币汇率、环境危机、粮食安全都是哈拉比关注的领域，可是面对中国记者，他愿意表现得

对“科学发展观”很行在。

“科学发展反映了共产主义的基本目标,它追求平衡和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有效落实,需要有中央集权,国家规划与人民群众的参与”,“与在野共产党和工人党相比,执政的共产党更具有组织能力来倡导科学发展,对抗环境污染和价格垄断。”最后又加了一句:为了科学发展,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联合起来!

布拉尔则说,中国,中国应该成为全世界为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奋斗的人们的灯塔,就像它1970年代所做的那样,这是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承担的责任,它将使中国的声望“高扬天际”。

事实上,当中国在经济领域获得成功,中国共产党应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领导者的观点便流行开来,但中共早在1982年就确定了党际交往的四项原则,反对领导与被领导之别,不利用党际关系干涉内政,不输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具体活动也以理论研讨会、代表互访等为限——2012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进军还在强调这些内容。

日本特色社会主义

“日本鬼子滚出钓鱼岛”,——2012年9月18日,日本共产党员小寺松雄在北京亮马桥看到了愤怒的标语,他还用生硬的普通话语向我描绘了成百上千矿泉水瓶掷向日本大使馆的场景。“民族主义的错误的表达方式让人担忧,这是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他犹豫着说出了他的结论。

一边是共产主义的理念,一边是中日纠葛的现实,你能感受到他的分裂感。小寺松雄是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驻北京记者,已经年满65岁,即将退休回国。

作为日共机关报,《赤旗报》历来被认为是对外友好的媒体,小寺松雄驻华6年,瘦小、和蔼的形象多次出现在中国官方媒体上,一次就中国“两会”谈信心,一次是宣传他对基层人大代表的采访,还有一次被用于赞赏会务人员的热情服务。

会面之初,小寺松雄一再强调,身份所限,言论会有所保留,但其坦率仍超出我的想象。

《赤旗报》驻京机构设在东直门的一栋公寓里,准备接替小寺松雄的记者正在整理房间,报刊、办公设备摆了一地,临时办公桌上堆满材料。在小寺的十八大报道里,贪污腐败、官僚主义被写进大标题,内文涉及国民收入10年翻番,科学发展观列为指导

思想,等等。谈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日本人的较真显现了出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是什么?目标是GDP世界第一吗?”他有点故作疑惑,感慨道,唐代的GDP可是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哟。

日本共产党的目标是什么?“日共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但目前是要成立保护宪法的联合政府。”事实上,日本共产党是发达国家共产党中最成功的一个,经历苏东剧变后仍有四十多万党员,为日本第四大党。

何时能联合执政?“21世纪的早期,10年20年。”在去年12月的大选中,日共原本计划夺取众议院的18席,最终仅得8席,比选前还减少一个。“我们失败了。”小寺说。

从1970年选择议会道路开始,日共就谋求通过竞争性选举执掌或参与政权,废除日美安保条约、全球废弃核武、保证国民生活等,都是它借以吸引选票的政纲。为了壮大统一战线,日共反对将特定的世界观定义为“国家哲学”,党员也可以信仰宗教,认可党章是惟一入党要求。

虽然在选举中不得志,但日共在日本国内的声誉还不错,被称为“最清廉的政党”。我小寺说,在日本的企业里,如果一个人被发现是共产党员,就会被区别对待,故意降低工资甚至解雇,因为企业经营者反感共产主义。“党员不管多么困苦,也根本没有受贿的想法,和延安时代的中共是一样的。”

由于主义相同,小寺对中国共产党的确会多出一点亲近感,但日本的报业竞争异常激烈,《赤旗报》选择了新闻本位的报道方针,它的中国新闻从不回避敏感话题,群体性事件、陈光诚、高层人事布局,总体来讲与其他日媒无异。

可以说说重庆吗?“从已经公开的事实来看,坦率说,对文化大革命作出肯定的评价,我是不赞成的,不根据法律来行事也是不对的,要依法办事。”

这些评价和他早年经历有关。小寺松雄20岁时加入日本共产党,那是1967年,而在一年前的7月,毛泽东声称国际上有4个敌人,美帝、苏修、日本反动派,以及反对暴力革命,承认苏修的日本修正主义者。

“所以日本共产党内的毛派分子,攻击、控制我们这些大学生,施加暴力。”小寺作出拳击中的格挡动作,苦笑着摇头。我立刻想起网络上日共毛派运动的影像,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南方人物周刊 杜强 林珊珊)

今天你读了吗？

书的危机



“4·23”世界读书日的发问：网络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纸质阅读将成为明日黄花？

我一向认为，每一个时代的文明都是多元力量或多元价值竞逐的状态，这种竞逐有时激烈、有时宽缓，但是无论如何，每一个时代的文明都不会是单一的色调。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感受到几股价值/力量正在激烈竞逐、拉扯中，而竞逐、拉扯的结果，将决定人类下个阶段的生命风格，而前述这个多元竞逐的格局，正与数位时代的来临息息相关。

第一，人们透过网络世界，尤其是各式各样的社群媒体得以进入更大范围的生活圈（包括虚拟的生活圈），进行更频繁的联系，可是在加入一个更大的社群之后，往往疏离了实际生活中人与人的接触。第二，数位世界造就了知识的公共性，造福无限，可是这也使得原先需要经费来维持及推进这个公共性的机制产生危机。第三，极轻、极薄、无纸造成不可思议的方便性，但是也根本地挑战了千年来的书本文化（Book Culture）。

本文所要谈到的书的危机，可以分成两方面。其中一面与前述数位时代的挑战有关，另一面则是与来自人文学界“自然科学化”的倾向有关。

2012 年我读了 Anthony Grafton《书本的危机》（Codex in Crisis），他说：“自印刷术之后，计算机与网络对阅读造成的影响，没有任何科技可匹敌。”我原来期待他能对书本的危机提出一些看法，但是这本小书大多是在讲书本、图书馆与读者的历史，虽然也触及网络及电子书，但对我所关心的如何保卫“书的文化”着墨不多。“书的文化”与计算机及网络的文化是否一定是彼消我长、你死我活的关系，目前似乎还没有解答，但人类努力设法使它们成为互补、伙伴的关系。

倒是第二个现象，我的了解比较亲切。西元 2000 年我开始担任台湾国科会人文处长，我观察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台湾的人文社会科学正逐渐从“书的文化”转变成“论文的文化”。也就是说，在自然科学强大的笼罩之下，人文及社会科学正在模仿自然科学，开始以撰写单篇论文作为他们最主要的表现研究成绩的方式。当时我们采取了一个政策，由人文及社会科学中心每年编 800 万新台币补助出版有审查的专书。有一次国科会副主委问我们：这个数目够用吗？没想到一年下来，根本花费不到 1/5 的预算。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论文文化”的压倒性胜利,表现为学术界普遍轻视或怀疑书的严谨性与贡献度,并狂热地追逐 SSCI 或其他有指针系统的学刊。学者的考绩与升等成绩表中倾向于把“期刊论文”放在最前面,而把“专书”放在比较次要的地位,或是仅仅当作“参考”。这是 18、19 世纪以来人文学科所未经历过的变化,进一步促成了“书的文化”的萎缩。我知道这个现象在中国大陆还不成问题,可是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已经形成重大的危机。

两三年前参观一家报社时,负责人略带欣喜地宣布“无纸时代”的来临:将来的报纸不用印出来,极可能是每家墙上挂着一个大型阅读器,订阅的人每天会从阅读器收到报纸,然后在阅读器上看;当然如果有“好古成癖”者,仍可以自备纸张印出。听得我胆颤心惊,使我心中几个美好图像逐渐模糊:普林斯顿市中心帕玛广场上那一尊少年阅读的塑像变得过时;美国有一则电视广告,一位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一面喝咖啡、一面把报纸折成许多折的老人,也变成明日黄花。

当然,也有人宣示“无书年代”的来临,电子书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电子书有无限的方便,一机在手,历览千古,不必像我弟弟,为了怕没书读,每天背着大量的书来来去去。甚至已有许多人

谈到,将来图书馆的藏书将“云端化”,则将来连到图书馆借书、看书,似乎可以省去。事实上,西方有些大学已经开始将图书馆改为“学习中心”(Learning Center)。

亚马逊书店(Amazon.com)的崛起则是更早的事了。当我发现可以轻易地透过网络从美国买到我想要的书时,已经是亚马逊开店多年后的事了,而且我注意到书店创始人在普林斯顿大学部时,几乎与我同时(我在博士班)。后来,台北有了博客来书店,不必逛书店也几乎可以买到任何的书。甚至我们过去引以为乐的逛古典音乐的唱片或 CD 店,也慢慢地被 iTunes Store 或其他线上音乐商店取代。

数位化及网络化,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世界,它带来了无穷的便利,也带来无数的好处,可是,它也使得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美好事物变得不再必要。但在“人之所以为人”的思考前提下,这些事物真的不再必要吗?这个问题引起我极大的注意,并且重新思考一些事情的方式及意义,包括阅报、读书、逛书店、上图图书馆、买古典音乐 CD。数位时代与它们的关系是“取代性”的还是“伙伴性”的?下一步如何发展,值得我们持续的观察。

(4-26 南方周末 王汎森
作者为台湾中研院院士)

(上接第 15 页)最近刘议员的利益申报问题……”“哦,这是不可以的,钱先生。”访问员说,只是传媒报道,未经廉署立案、调查、定案的事例,是不可以用来做 ICAC 正式宣传资料的。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我一时无语。思绪飞至别处,感动,也感伤。作为异乡人,我特别欣赏香港有廉署。当然我也有不解的问题,比如,廉署是如何选择 MVA 顾问公司来实施调查的(据了解,这是一间长于都市规划和交通体系发展研究的顾问公司)?

MVA 的这位访问员女士,给我的印象质朴,

热情,熟知香港廉政制度。她行色匆匆,额头汗珠点点。来时走错了楼层,迟了 5 分钟,见面连声致歉。因为入户不便,我请她在公共休息处交谈。她一开始就问,是否介意被途人听见?结束前有一两个问题涉及隐私,她见有人经过,便把声音压得低低。那天,她忘带了廉署送给被调查者的礼物,第二天晚上 10 点半又特地送来。

那是一支笔,银白漆黑两色。上面写着:
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南方周末 钱钢 作者为传媒学者)